

■关注

文学永远是面向未来的事业。20年后,将是“95后”、“00后”走上中国文坛的时候,而今天他们正在接受文学启蒙,今天的阅读将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创作,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在课外,这一代人主要通过网络进行阅读,网络文学自然成为他们最广泛接触的内容。而他们的父辈中,很多人无法接受网络文学。这样,两代人关于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就出现了差异,久而久之,便会产生断裂。

十多年来,在涉及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主流化、精英化等若干议题时,我们总是在讲如何引导和帮助网络作家进行自我提升,如何提高网络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等等。对创作的引导当然十分重要,但是,如何站在时代高度,深刻理解和认识这一新的文学现象,这一工作或许更加重要。这是一项双向的工作,引导者要先去学习,先“引导自己”弄清楚搞明白,再去引导别人,才会产生实际效果,才是对网络文学发展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化,与中国社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阵痛过程中的新生,所遭遇的历程是一致的。在这一框架之下讨论“网络文学主流化”,不仅不构成对当代文学的颠覆,反而是在探讨如何延续和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

在网络文学生态系统中,非现实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恰恰是其迈向主流化的一大障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础的,网络文学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悟空传》(今何在)、《庆余年》(猫腻)、《惊门》(徐公子胜治)、《天才相师》(打眼)、《锦衣夜行》(月光)、《步步惊心》(桐华)、《琅琊榜》(海晏)、《浣紫袂》(天下尘埃)等一系列网络文学“神作”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一是非现实主义手法,二是对传统文化的接续。显而易见,文学的虚拟性在网络文学这块地盘上获得了成长,但它的出发点并非是对传统文学的背叛,而是大家通过互联网参与文学写作形成的集群效应。但在客观上,网络文学选择的这一条道路,与当代文学之间形成的“观念”鸿沟着实令人担忧。邵燕君认为,“需要对文学传统有了解的人,把文学的传统引渡到新的媒介中去,而不是任由媒介革命带来文化、文明的断裂。”我以为,这是比较冷静、客观的看法。同时,传统文学界、理论界要求网络作家向托尔斯泰看齐,以鲁迅为标杆,不仅不切合实际,更是对网络文学的误解。

如何从理论上界定网络文学?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范伯群先生对大众文学发展脉络的指向,即冯梦龙——张恨水——金庸,网络文学由此接续。这条主线将网络文学纳入中国通俗文学范畴,应该是对网络文学主体较为准确的定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心理需求,恰逢互联网普及运用,大众文学终于借网络实现了爆发式成长。网络文学的“落地开花”、“野蛮生长”说明文学的大众性有其历史基因,一旦气候温度适宜,就会蓬勃再生,星火燎原。值得引起思索的是,知识精英建构的经典文学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应变,以适应民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

在网络文艺领域,网络文学发挥的是领头羊的作用。从1998年发端起,网络文学就是最先起步的文艺样式,受众最广泛、内容最丰富、形式最自由,由其衍生出本土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剧、网络有声读物等,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为新世纪我国文艺发展打开了辽阔的空间。

由此,网络文学的主流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任何一种文艺样式,要想深得民心,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其价值观、审美观必须经得住时代的考验。供求关系和读写关系显示出网络文学同时具有商业性和文学性两个特征,两者之间如果是共生关系,网络文学就会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美学价值。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网络文学在坎坷中摸索前行,逐步形成了一套自我修复功能,但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新的主流化文学必须承担起创立新的中国话语,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塑造新的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

从发展的角度看,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不仅是网络文学自身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求和历史的必然。有人提出网络文学的商业化是其主流化的拦路虎,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一旦迎合消费目标,将丧失其纯粹性。上述观点的确应该引起重视,当前网络文学存在大量跟风、雷同,乃至抄袭现象,都是商业化在作祟,值得警惕。然而,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看,商业性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缓释;从大众需求积极性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存在的症结也基本上是广大读者所排斥的。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文化层面上已经形成战略思维,“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字字千钧,当然包含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支持、引导和管理。

陈忠实：
现实主义的完成

□陈晓明



2016年4月28日陈忠实逝世,说“巨星陨落”有点套话,说“现实主义的时代终结了”也是言过其实,但它肯定是一个事件,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去面对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并非只是哀悼的仪式,更有必要的,是让我们去思考他的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什么意义;也让我们去思考陈忠实所标志的那种文学的高度和方向是否永久有效,是否真的是一种完成和终结。

生逢其时的《白鹿原》

很显然,《白鹿原》给陈忠实赢得声誉,迅速如日中天,尽管这个名声来得有点晚,年过半百,实在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岁月无情,时光易逝。这个人默默地写了半辈子,从初二开始就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赵树理全部的中短篇小说,于23岁(1965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开始,他的文学启蒙和起步并不晚,但一直默默无闻。中间偶有获得过一些奖项,例如,其中9部(篇)作品获得全国或刊物大奖,但都不足以使他跻身一线作家行列。直至1992年《白鹿原》出版,那时正值文学的萧条时期,出版社开始几乎咬紧牙关印了1.5万册,投石问路,哪想到石沉大海,并无动静。据说,当时几位能耐极大的编辑都急得束手无策。说《白鹿原》身逢其时并不为过,市场营销的伎俩开始崭露头角,《白鹿原》这才借助市场的自由空间,开始它声誉日隆的行程。市场的成功反馈到批评界,各种争论、批判、赞扬的声浪,百家争鸣,创建了一个经典化《白鹿原》的氛围。

1993年,陕军东征,陈忠实和贾平凹,一部《白鹿原》、一部《废都》,发布会和研讨会先后分别在人民大会堂热烈举行。这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新出发,标志着一个断裂时代的文学重振旗鼓。在那样的时期,把陈忠实和贾平凹称之为“纯文学最后的大师”并非只是稚拙粗鄙的媒体应急之举,也确实是中国文学整装待发的迫切需要。总之,陈忠实就此成为“纯文学”重量级的作家,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几乎不会遭致异议,当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桂冠的话。

但是,《白鹿原》成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经典作品并非出自偶然,应该说,陈忠实默默在他认定的现实主义文学土地上耕耘了几十年,最后成就了《白鹿原》,也成就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此前,我们也可看到陈忠实的几部颇被看好的中篇小说《初夏》(1984)、《四妹子》(1985)、《蓝袍先生》(1986)等,笔法已经显出冷峻细致,从容不迫的叙述直抵人物性格

的方方面面。当年,老作家王汶石读了《初夏》就禁不住提笔给陈忠实写信道:“是您的作品保持着陕西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处理农村生活题材时的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洋溢着渭河平原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格。”(《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可以见出,那时的陈忠实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贡献已经受到重视和肯定。《蓝袍先生》发表后,白桦就撰文予以肯定:“作者毫无掩饰地写了现时代中的一个普通人物的人生坎坷,题旨与基调都一改旧辙……”(《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陈忠实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数十年,这才有《白鹿原》的厚积实发。

但《白鹿原》确实是陈忠实又一次突破自己的“旧辙”,更是对中国既定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融通、总结和提升。中国当代文学很久以来没有出现气势恢弘而有大气象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他文化上的思考,富有现实感地回应了当时的思想困扰,评论者和读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把它看成是民族的史诗。作者在卷首也引述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标举文化的价值

《白鹿原》以史诗式的结构来把握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涵盖激烈的社会矛盾:革命、日本人的侵略、民族冲突、阶级斗争。20世纪上半页的历史大变动构成了小说展开的背景,白鹿两家几代人关于土地争夺的传统故事,转向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政治选择。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矛盾是土地争夺的矛盾,是宗族统治权的矛盾,也是传统道理想矛盾的矛盾。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和鹿兆鹏的对立关系,则引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政治冲突。小说的矛盾展开是以正反、善恶、高下、黑白、是非的二元对立形式展开的。整体上小说叙述是现实主义的笔法,但陈忠实做得明晰、棱角分明。

当然,这样的二元关系亦有反向和多次转换的形式。白嘉轩这个乡村道义和德性的化身,他的长子白孝文却一度落到吸食鸦片、讨饭乞食的地步,后来为了一个饭碗加入国民党;鹿子霖这个奸诈之人,他的儿子鹿兆鹏却背叛阶级,深明大义,从小就同情劳苦大众。他们后来的命运也多次变换,虽然没有明确最后的结局,但却有可能再次被颠倒。白鹿两家的矛盾并未解决,但却让更强大的历史冲突介入进来,使得传统中国的家族式矛盾变得无足轻重。白鹿两家在20世纪的遭遇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中国民族的命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高度也在这里体现出来。

陈忠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始终浸含着充足饱满的传统和西北地域文化的意蕴,陈忠实不只是把文化融入小说,更重要的是,他标举传统文化的价值。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他的《白鹿原》等作品推动了中国文化向传统价值的复归。这条路径是否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必然(致胜)路径,这可以讨论,但他在这种历史重大变化中处于引领的位置则是值得重视的。

《白鹿原》如此明确地把传统文化提升到正面积极的意义上来认识,这在90年代初可以看成是传统文化重振旗鼓再出发。“寻根文学”随着“85新潮”退潮,追逐“现代派”的热情内化为先锋派的小说形式实验,90年代“寻根”已经销声匿迹,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西北地域文化包裹的《白鹿原》与寻根的一脉相承。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反思传统,崇尚西方价值。“寻根小说”却背道而驰,提出文化寻根,尽管它的直接缘由是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但它也是有现实的深厚依据。《白鹿原》的核心意象“白鹿”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虽然有些空灵或含混,但还是较为明确地指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白鹿原》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的态度,它反映了90年代初中国文化的自我建构需要,虽然也存在着明显的理想化倾向。

总之,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推进,还是对乡土的本真而又富有历史感的表现,陈忠实对中国当代文学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完成了他自己,也完成了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现实主义。陈忠实的逝去,确实意味着这种几十年磨砺而成的乡土中国现实主义书写的名家的离去。中国文学不只要纪念,更要在他所开创的道路上另辟蹊径,像他一样有勇气去超越自己、突破自己,为中国当代文学划下另一个新的时代。

瘦硬雄奇的西北风情

作为多少年书写西北土地山川的乡土文学大家,陈忠实把乡土文学的艺术表现做得平实、自然、本真。他继承了柳青、沈从文、赵树理的乡土文学传统,又与同时代的路遥、贾平凹等西北作家各分秋色,写出西北丰富多样的黄土民情,人世悲欢、命运遭际。相比路遥黄土梁上的厚实凝重,贾平凹商州地界的粗拙玄妙,陈忠实显示出他渭河两岸的瘦硬雄奇。陈忠实对家乡土地上的人们感情很深,始终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王汶石先生说他:“您曾同他们一起在一间茅草屋顶下度过困苦的生活,又同他们一道经历过解放的喜悦。”(《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陈忠实在公社做过长期的基层工作,即使后来不在公社做实际工作了,“但依然被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牵扯,所苦恼,甚至牵肠挂肚”。回到村里,“有时在路边的树荫下蹲下来,一扯就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谈到的许多事情,常常牵动我的感情。”(《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陈忠实的乡土文学并不只是书写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他们自在自为的历史,而是把他们的生活纳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去,与他们的命运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尤其是他的《白鹿原》,把乡土中国的传统、现代性进程,社会剧烈变革以悲剧的组结内在化地结构在一起,赋予它以强大的历史感和深重的命运感。

正是表达了我们对这个孵化过程的敬畏之情。

■短评

戴潍娜：一个诗人的万花筒之心

□梅丹理

正是表达了我们对这个孵化过程的敬畏之情。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它如何发生,但我们可以感知它正在发生。我们渺小的脸孔,就像指向其即将成为的至高无上辽阔无边的宇宙人格的指针,然而,我们无法走到那么远,于是,我们的面孔成为一个临时舞台,一个用来对抗脸孔之下或脸孔之外无限深渊的有限的防护罩。戴潍娜在诗中关于宇宙人格的符号非常丰富,我于是可以用她的符号来思考我的问题。

戴潍娜在《不完全拷贝》一诗中“博士”的刻画狡狴且顽皮。比如这一句“为了立刻看到美国/修道者开天眼/科技开发视频/博士的方法是试验

一种既脆弱又尖锐的质地。她在写到一个迷雾笼罩的女性角色时用到这个词,让人遐想。同一首诗中,她描写戏水用了另一个词语“鬼水”,让我联想到鸭子在水上漂浮之态。这个词在一些方言中用的多,鲁迅在《社戏》里曾经用过。回声女郎本为妖,里面有一些生物的野趣。

我很难辨别戴潍娜究竟是那一类高智,她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基于其女性主义思想根基如鸟贼一样喷射出墨团般思想的抒情诗人?一个神话讲述者?一个恶作剧的淘气鬼?无论如何,我享受阅读她的诗歌,且会继续这种享受,并借此思考属于我自己的问题。

戴潍娜的用词常有别致,《回声女郎》中,她两次用到“气根”一词,呈现

■看小说

老九《差点以为是他杀》
重返现场的一种尝试

老九的小说《差点以为是他杀》(《雨花》2015年10期)是复兴煤矿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它携带了一种新的辐射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当今工业文学几成凹地低谷的状态下,这篇写国企改革的小说露出了某些峥嵘之气与现代先锋小说的叙事品质。

故事的梗概其实是一起死亡事故的快速回放:主人公老九在两场盛宴、一次暴力之后的“意外死亡”。整个故事按照婚宴——暴力——死亡三部曲承起转合,尘埃落定,由婚宴酒场急剧转入暴力和死亡的现场。作者没有执着安排更多复杂的情节、恩怨的脉络,而是尽快地还原过程,回到现场,小说迅速、干净、一意孤行,凸显了现代叙事的魅力与技巧。作者是从自己的“死亡”开始叙述,采用倒叙的方式,在生命结束之后,“依然活着”的主人公带领我们返回婚宴与暴力的现场,使小说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虚无感和魔幻性质,这让一篇本来力道沉雄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形式上生出了现代主义文学闪烁不定的枝节。

主人公的死亡不是小说的结束,而是一个切入点。通过死亡来见证权力的任性、人性的乖张、信任的没落,代价确实是太大了,也太残忍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老九在此埋下曲折的伏笔:主人公在最后一刻写下了自己的交代,让一个人的死亡具有了肃穆的宗教感和再生的意义。这个结尾不仅让小说的整个叙事视角发生了转变,而且也作者与读者重返现场的方式、路径变得更加广阔和开放。

(王建旗)